

北宋以前河洛都市文化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影响

李爱军, 吴宏岐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州 510632)

摘要: 先秦到北宋时期在河洛地区的洛阳、邙城、开封等都市规划中形成的“择中”、“负阴抱阳”、“城郭一体”、“中轴线”等规划理念,是我国历史都市规划的时代典范。通过对秦汉以后的番禺城、兴王府、子罗城等广州城市规划在选址、空间布局、功能分区方面的考证,发现其受到历史时期河洛城市规划理念的深刻影响,同时又根据广州商业发达的自身特点,进行了合理改造。这种区域城市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奠定了广州岭南中心,千年商业都会的地位,是对历史河洛城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关键词: 河洛都市文化;规划理念;城市规划;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11)01-0151-04

0 引言

城市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区域城市群的空间布局、都邑关系,城市个体的方位选择、空间规制、建筑形式都体现着地域文化的内涵。都市的规划理念是历史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文化形式相似,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会产生不同的规划理念。从文化中心向周边区域传播扩散,在文化扩张的前提下,出现城市规划布局同质化的现象。

长期以来,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文化内涵丰富,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都市文化是中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是我国从史前原始社会到北宋时期的都市重要起源地,其都市规划理念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处于城市规划实践的主流地位,被周边文化辐射区效仿、借鉴。目前,随着对古都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历史都市的规划方面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南越、南汉、北宋等北宋以前的广州城市发展的3个重要时期,梳理在北宋以前河洛都市文化的传播对广州城市规划发生影响的过程,探讨其城市规划对河洛都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为我们城市功能的规划、空间结构的划分提供历史借鉴和新的思路。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文化产生的地域范围,中原都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都市文化,包括今河南、山东大部、关中、晋南、冀南、苏北、皖北等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区域的历史都市,即从史前原始社会到北宋时期,在本地区形成的黄河文化圈内所有的城市在发展规划实践中产生的思想理念。而其狭义范围,是指以河洛地区为核心,主要包括洛阳、

邙城、开封等对我国城市规划理念的形成发生过重要影响、起引领作用的区域。和广义范围相比,其实质是文化空间上的宏观与微观,周边区与核心区的关系^[2]。作者在讨论都市规划理念过程中,以河洛文化为主体,根据研究需要,兼涉中原其他地区。

1 先秦番禺城规划影响

1.1 先秦河洛都市规划理念的形成

从史前开始,河洛地区就出现了城市的雏形,有“城市之源”之称,在先秦时期,关于城市的选址、外形规制,内部结构已基本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划理念,早在夏商时期,统治集团就开始在中原地区修筑城池,目前,夏代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是历史早期城市遗址的代表。建于约公元前13世纪的晚商国都殷(今安阳市),在甲骨文中记载“中商——大邑商居土中”^[3],根据商代的疆域,选择居中的殷作为建都之地。在城市空间规划上,现代考古证明,殷都是以宫殿区为中心,不建城垣的开敞式城市。已经初步确立了都市规划的“择中”理念^[4]。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广为营建都邑,洛邑是当时的东方政治中心,“周公营洛”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我国城市规划的典范之作。在城市选址方面,《史记·周本纪》载:“北望岳鄙,顾瞻有河”,城市选址推崇负阴抱阳、控山带河的形胜地形。为便于从政治、军事上控制四方,根据西周疆域及交通状况,确定洛阳为“天下之中”^[5]。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和军事为主,围绕王城,修筑城垣;融合礼制治国理念,将等级秩序、尊崇祖先等政治理念赋予城市规划之中,继承商代国都以王宫为中心的空间结构,据《逸周书·作雒》载:洛阳城内建太庙、宗庙、明堂等五宫;注意城市规划整齐,外形呈方形,内部采用经纬涂制布局,里坊制开始萌芽;提出明确的城郭分工的城市规划理念,注意王城与郊畿的有机

收稿日期: 2010-02-05; 修回日期: 2010-12-15

作者简介: 李爱军(1969-),男,河南汤阴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研究,(E-mail) liaij2006@126.com。

结合。在此实践基础上,产生了《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对我国城市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想城市规划指导理论^[6]。

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分裂,经济直接关系诸侯国力的强弱。城市的经济职能得到充分重视,同时,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的选址更注意区域的交通、水利条件、周边土地的肥饶,保证城市的无洪涝灾害和物资供应的需求。诸子著作都提出了新的都市规划思想,如《管子·乘马篇》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长期的战乱环境影响下,城市规划更突出其军事防御及对居民的保卫职能,《越绝书》载范蠡语,“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墨子·杂守》提出的“市去城远;畜积在外;富人在虚”均不利于防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郭一体”的都市规划理念。在规划实践中,在中原地区产生的著名城市有新郑、陈、侯马等,它们不仅是各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是区域的经济中心。各国都城由政治堡垒转化为军事和经济职能兼备城市。在城市外形上,面积比周以前的城市面积有了很大的增长,除平原地区外,不刻意追求方形城市的形状。因地形形势而异,除关中咸阳以外,中原山东各诸侯国城市都建立高大的城墙,除宫殿区的宫城以外,修建郭城,居民区、手工业区也得到城墙的有效保护,宫城大多出在南面和处在北部的郭城相接如赵邯郸城、齐临淄城都是这种规划结构的都市^{[7]18-20}。在城市内部结构中,《礼记·王制》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里)市封闭结构制度逐渐形成。先秦时期在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形成的都市规划理念,在以后的秦咸阳城与汉长安城的规划中得以具体运用并为包括广州在内的地方都邑规划效仿,“宫室百官同制京师”^[8]。

1.2 先秦河洛规划理念对南越番禺城规划的影响

目前,关于广州城市建设的起源,学术界基本认定起源于秦汉时期,虽然史书有春秋战国时期南武城、楚庭的记载,但尚没有发现可供验证的考古证据。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统一岭南后,南海尉任嚣在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山下修筑“任嚣城”。应是广州城市建设之肇始,任嚣作为秦国将领,深谙“择中”与“负阴抱阳”的中原地区城市规划理念,认为“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9]。在具体方位规划上,选择靠近越秀山的地方依山傍水筑城(现在广州市中山五路财政厅前地点)。除了军事上借地理位置险要而使城池牢固达到防御敌人侵袭和免受水淹外,又便于取得流入城内的淡水^[10]。“因古时,珠江三角洲不及现今广大,咸潮尚可涌至番禺城下,这和《管子》所说的‘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城市规划理念相符。”^[11],以后赵佗(河

北真人)接任南海尉,割据岭南,在此基础上扩建南越国都番禺城(即赵佗城),其规模“周十里”,外形呈长方形。就城市内部结构而言,以新建的西部为宫城区,南部官署区,而居民区、商业区则主要分布在东部原任嚣城内和外郭区,明显受到秦咸阳城与西汉长安城等都市规制的影响。虽然,汉武帝时期灭南越国,赵佗城被毁,南海郡治南移 30 km(今龙湾、古坝一带),但到三国时期,孙吴名臣步骖“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12],把州城治所迁至番禺,扩大赵佗城,后世称之为步骖城,其南门在番、禺二山之间,中间直通海边的南北大道(今北京路到西湖路段),广州城址以后都是在此基础上拓展,“任嚣城”与南越城是历史广州城的奠基之作^[13]。

2 南汉兴王府规划影响

2.1 邺城“丁字形”城市规划模式的概况

两汉是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封建文明高峰期,国都长安和洛阳城市平面布局均符合《周礼·考工记》的规划理念,外形基本呈方形,宫殿区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城市内部的主要组成部分。内部结构呈平行线网状结构,“居室栉比,门巷修直”,城市坊(里)市封闭管理结构得到进一步确立。东汉末年,曹魏以邺城为霸府,大兴土木,从其城市规划布局,在继承历史城市规划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新规制^[14]。其规划的基本特征是:(1)划定城市功能区,宫殿、官署、市场、居民区各划定一定区域。(2)宫殿区、衙署办公区北移,有丁字形干道布设于宫殿区之南,呈现中轴线结构,南部中轴线两侧是居民区、集市区等按照里坊结构设置。(3)在城市内部设置铜雀园园林区,把园林建设摆在城市规划的重要地位。曹魏对邺城的城市规制模式,对后来的北魏的洛阳城、隋朝的大兴城、唐朝的长安城、洛阳城,元大都的城市规划都发生了重要影响^{[7]37-39}。以后五代时期的岭南割据政权南汉兴王府,就是通过对唐长安城规划的效仿,对“邺城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2.2 南汉兴王府对“邺城模式”的效仿

广州城池自三国东吴步骖建城以后,长期没有扩建。唐朝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开始扩大,形成子、罗城的规制结构,在传统的以保卫宫室、官衙等政治中枢为主体的“城”的基础上,逐步向“城郭一体”的空间布局过渡。广州都督宋璟、岭南节度使杜佑等人教民“陶瓦筑墙,列邸肆”^{[15]4391}、“以陶瓦易蒲屋”^{[15]5032},在建筑材料上推行以瓦舍易茅屋,起耐久住、防火的功效,都增强了中原都市文化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影响。

唐末元祐二年(公元 905 年)刘隐(上蔡人)任清海军节度使,着手凿开禺山,扩建广州城直抵珠江边,“州城三重”后其弟刘岩继任,称帝广州。南汉定都广州,称兴王府。刘岩按照唐的都城制度营建兴王府,效仿唐长

安城成熟的都市丁字型中轴线模式,对广州城进行重新规划。新规划的兴王府城从北至南,有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主干道主要有2条:一为由宫城南门,经内城,直到外郭城南门的南北向的直街,位置大致即今北京路;二为宫城南面,由城东门与城西门相连接的东西向大道,此为内城的主要横街,位置大致即今中山四路一带。上述南北向与东西向大道,呈“丁字形”交汇,构成了南汉兴王府城的基本空间架构。在城市区域分工上,以北部中心城区为皇帝施政和皇家起居之内宫,往南中区为统治机构所在地的皇城,即中北部为政权中枢所在;再往南,南区至珠江边为居民和商业区。西区为蕃坊,是城外商业旅游览区;东区及北部郊区为官僚、贵族区;过了珠江河南是坛庙祭扫区和陵园区。同时,“仿唐上京之制,置左右街使”^[16],当时这种城市分区布局,仿效了邺城模式后的长安、洛阳等都市的丁字形,中轴线结构,突出王权在空间布局的地位。晚唐以后,随着广州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坊市制度已经被破坏,兴王府城内部空间采取的是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厢坊制”结构,要早于宋都开封城的“厢坊制”城市规划,这是根据广州对外贸易经济发达的实际,在城市空间的创新性布局。这种在以政治为空间中心,兼顾商业经济的空间发展的城市规划思想,奠定了广州城市以后发展的基本规划格局。

3 北宋“子罗城”规划影响

3.1 宋都开封“三重围”城市规划模式概况

两宋是我国城市规划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北宋以开封为都城,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开封的地理特征,对都市的规划进行了新的调整,具体特征如下:(1)以宫城为中心,依次里城(子城)和外城(罗城)的三重围结构。宫城是皇帝宫殿区,内城是衙署办公区,外城是居民区和手工业区。(2)随着城市商业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内部结构上,打破了历史以来的里坊制结构,出现了坊市合一,按街道管理的厢坊结构^[17]。在都城的主导下,宋代全国很多州府一级城市规划不仅借鉴了这种子罗城的城市空间结构,同时,更注重城市商业空间的布局。

3.2 宋代广州“子罗城”城市规划的改造与创新

两宋时期,作为州城,广州城重新规划、修缮10多次,城区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其中,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五代南汉的旧城为基础修“子城”(约在今天的吉祥路、中山路、小北路、越华路一带),周长2.5 km。作为衙署办公区;北宋熙宁初年,在子城东面、南越赵佗城故基上加建城墙。修筑东城(今大东门,西抵今教育路、西湖路一带),周长3.5 km,与“子城”合一,作为居民区和商业区;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增筑西城(约在今北城根、人民路、大德路及子城以西的范围内东与子城隔一西湖),周6.5 km,其作用主要是蕃汉杂居地商业市舶区。由于商业贸易发展,三城在南宋中期已经

包容不下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商民在珠江沿岸形成沿江商业区。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知广州陈岷创筑东西雁翅城,皆以三城南面为其北部顶点,向江边延伸,即在南城墙东西两翼增筑城墙至海边,使城南商业区也处于城墙的保卫之中。在城市内部规划上,子城区街道布局仍呈丁字型,面积最大的西城为商业市舶区,呈井字型。另外,受中原城市建筑规划文化的影响,城外在利用自然水道的基础上,人工修筑护城壕,东、西分筑有东濠与西濠,城南则为沟通东、西濠的玉带濠。传统的版筑土城墙也改砖城墙^[18]。至此,在广州城市规划上,商业区成为城市空间的主体部分,确立了广州千年商业都会的地位。

4 发生影响的历史背景

秦汉以来,随着中原地区的发展与政治的统一,开始向南粤地区扩张,秦越一家,在岭南建立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并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在农业等先进技术传入岭南的同时,先秦时期形成的河洛文化中的成熟城市规划,也随之传播到岭南地区。任嚣、赵佗等谙熟先秦以来成熟的中原城市选址和规划思想,运用到广州城市规划之中,奠定了广州在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令人感兴趣的是,除两宋以前的统一时期,在中央委派的官吏主持下的城市改造以外,南越与南汉两个割据政权存在时期,是广州城市发展受中原影响最大的时期,这是因为这些割据政权的主人和主要官吏均是长期生活在中原的人士,在思想上奉中原文化为正统。由于战乱提供了短暂岭南割据的历史时机,在没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礼制约束的情况,效仿秦汉、唐等当时中原都市风格,治宫室,建衙署,修王陵,建城池,使洛阳等中原都市规划的理念在广州得到较为彻底的贯彻,强化了广州作为岭南政治中心的城市地位。

秦汉至唐朝以前,广州城市规划主体是对宫室、官署等政权办公居住区进行保护,而更大范围的居民区、工商业区处在没有城墙保护的外郭,不属于城市规划之列,形成“有城无市”或“城大市小”的城市规划格局。其原因是除消灭割据、改朝换代的短期战争以外,岭南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中,将商业区保护在城池以内的动机并不强烈。唐宋时期,随着黄巢义军、农智高叛军等对广州的严重破坏,凭借城池保护政府和居民、“城郭一体”的河洛都市规划理念在广州得到彻底的贯彻,唐代的子罗城、南汉的三重城、宋代的三城制结构,均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北宋以前的中原都市,在一定历史时期曾都有过商业繁盛时期,但主体是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商业只是城市存在的次要组成部分,在城市规划理念中,更多的是要求对政治的尊崇,和对城市严格的等级管理。北宋以后,随着中央政权从中原地区的北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区域政治管理成为河洛城市的主要功能,和历史政

治中心、商业都会不可同日而语。广州濒临南海,对外贸易的商业都会地位秦汉至今没有衰落,历代中原政权,均将广州作为“天子南库”、“财富渊藪”,和中原城市管理区别对待,唐代以后在此设置市舶司等有别于中原城市的外贸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上,除和中原都市同样将政治管理机构设置在城市的中心位置以外,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业区、对外贸易区在城市空间上占据的空间,成为城市的主要规划部分,岭南文化的商业性与海洋性在城市空间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实现了城市规划的创新。唐以前中原都市的严格里坊制度,在广州历史城市规划中并没有得到过彻底的贯彻,这是历史广州城市规划思想创新的主要历史文化基础。

5 结语

文化的空间特征决定了文化有明确的起源地,文化空间传播的多样性和模糊性特征。河洛都市文化的城市规划理念是在历史王权政治、农业经济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地理,集政治、军事、生活功能于一体的城市规划理论,洛阳、邺城、开封等经典都市规划模式,对包括岭南在内的周边地区城市规划发生过重要影响。加上历史时期中原对岭南政治影响的不均衡和广州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背景,河洛都市文化对广州城市规划影响的发生机制并不完全是直接的照搬,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间接的借鉴和潜移默化的渗透,对广州城市的肇建和发展发生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是深远的,即使在现代的广州城市空间上,还可以看出有着河洛都市文化风格的中轴线结构。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 10[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87.

[2] 程有为. 河洛文化概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6.

[3] 李雪山.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4(2):99-105.

[4] 黄建军. 中国古都选址与规划布局的本土思想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38-42.

[5] 李久昌. 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164.

[6] 汪德华. 中国城市规划史纲[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45.

[7] 班固. 诸侯王表:汉书卷 14[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94.

[8] 司马迁. 南越列传:史记卷 113[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967.

[9] 杨万秀,黄淼章. 广州简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5.

[10] 徐晓梅. 古广州的城建规划考略[J]. 羊城古今,1988(2):42-44.

[11] 酈道元. 水经注:卷 37[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709.

[12] 曾昭璇. 广州历史地理[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233.

[13] 陈桥驿. 中国七大古都[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92-98.

[14] 董鉴泓. 中国城市建设史[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37-39.

[15] 欧阳修. 新唐书:卷 124[M]. 上海:中华书局,1975:4391,5032.

[16] 梁廷枏. 南汉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7] 李瑞. 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78-84.

[18] 陈代光. 广州城市发展史[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95-105.

The Impact of Heluo Urban Culture o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Guangzhou City before the North Song Dynasty

Li Aijun , Wu Hongqi

(History Department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efore Song Dynasty, in the center of the Central Plains of Luoyang, Yecheng and Kaifeng, urban planning ideas such as “optional”, “negative Yin hold Sun”, “inner-one”, “axis”, “Li” and so on are the classic models of urban programming in ancient China.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e verified the urban planning at the site selec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al districts in Guangzhou, such as Fanyu, Xingwang, Ziluo city etc, we found that it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is partition idea. While according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the planning has also been innovated. This transmiss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features laid a position of Lingnan central urban and millennium business capitals, simultaneously it inherits and innovates Heluo’s urban culture.

Key words: Heluo urban culture; the planning ideas; city planning; Guangzhou City